

黔 訊

(总第101期)

軍大人

高銳



高举旗帜 科学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2007年12月25日(不定期出刊)

二野军大贵州省校史研究会编

庆祝建军80周年(一)



在筑校友庆祝建军80周年，部分校友、家属集体合影

主席台：从右至左赵一民（中原军大老学长）、何健伟（理事长）刘敬之（原二团三连指导员）、罗梅欣（原女生大队四中队队长）、罗梅欣（二野军大女校友）胡宗喆（副理事长）。



主席台右边穿白衣站立者系黔西南州校史会理事长赵礼文在致词。

庆祝建军80周年(二)



全体起立唱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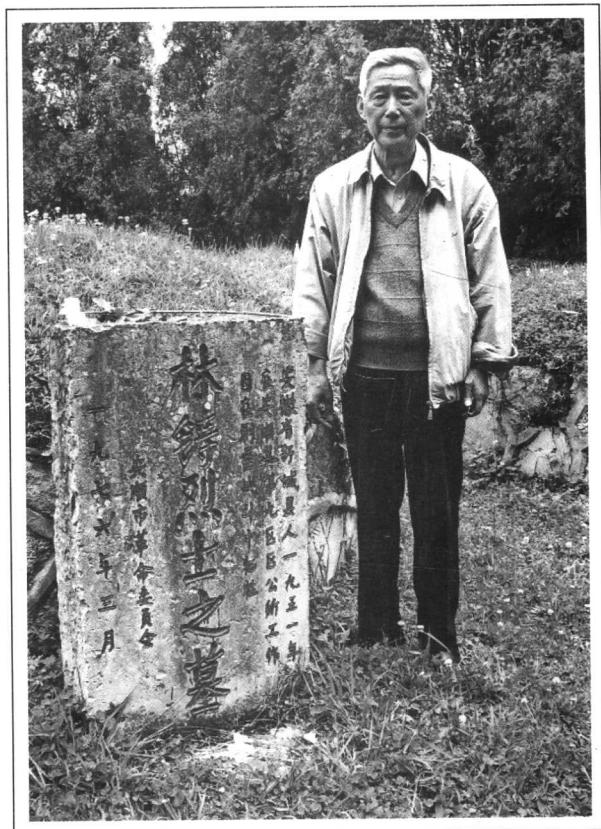
校友家属何瑾在表演舞蹈



三位女校友自左至右丁小英、辛瑞玉、吴凤珞在歌唱。

王 国 恒 校 友 祭 扫 林 铸 烈 士 墓

(2007年清明节)



林 铸

(1930——1950)

(贵州省民政厅1982年版《烈士英名录》第七本12月有林铸烈士名录)

林铸,男,安徽省舒城县人。1949年6月参加二野军大,任学员,同年10月,进军贵州,编在二野军大二团。到贵州后,分配在安顺县双堡区任工作员。

1950年2月,在双堡区开展工作时,被土匪杀害。牺牲时年仅20岁,已追认为革命烈士。

编 前

《黔讯》已出满了 100 期。再次向校友们表示谢意，谢谢你们十年来对《黔讯》的支持和关爱。

今天出版的是 101 期《黔讯》，从这一期起，改为不定期出版了。由于是不定期的出版，在时间上不可能有定数，如果校友们想提前了解一下情况，可打 0851-5893551 电话询问（最好是在晚上打来比较可靠）。

承蒙校友厚爱，赐稿不少，仍限于篇幅，不能一次刊载完，将陆续刊出，特此顺告作者。

本期封面《军大人》题词，系原华东军政大学校首长高锐将军书写，由华东军大校友程嘉树同志提供，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庆贺《黔讯》出刊一百期

李新生（哈尔滨）

黔讯一百期，美名天下传，
耕耘有十载，每期五万言。
诗文情共茂，影画称双艳，
怡我军大人，喜有百花园。
抒情著如文，言志写诗篇，
挥毫舞龙蛇，泼墨作画卷。
传战友情谊，寄故人思念，
忆峥嵘岁月，颂如霞满天。
端赖此园地，慰我垂暮年，
念兹辛劳者，饮水要思源。
编辑与发行，辛苦千百遍，
读者一声谢，祝君身常健。

宽心谣

赵璞初（92 岁作）

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遇事不钻牛角尖，人也舒坦心也舒坦。
每月领取退休金，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少荤多素日三餐，细也香甜粗也香甜。
新旧衣服不换样，好也能穿差也能穿。常与知己聊聊天，古也谈谈今也谈谈。
全家老少互慰勉，富也相安贫也相安。家孙外孙同样看，人也喜欢女也喜欢。
早晚操劳勤锻炼，忙也乐观闲也乐观。心宽体健养天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72位在筑校友、家属聚会 欢庆二野军大（二团）进军贵州58周年

10月16日这一天，是我们贵州二野军大校友们固定的纪念日——纪念进军大西南（二团进军贵州）。

2007年10月16日是二野军大二团进军贵州58周年，在贵阳的72位校友、家属在河滨公园假座《竹香居》举行纪念活动。

当年，二团进军贵州的875位同志，而今已是近二分之一的同志离我们而去，他们为建设贵州做出了贡献，有的牺牲了，有的英年早逝，有的积劳成疾病逝。为此，在我们欢庆进军58周年之际，向逝去的校友致以哀思。

2007年，确是不平凡的一年，与祖国有关的是香港回归已10周年，与军大有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现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再次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七届一中全会产生中央领导机构，全国欢庆。

58年前，解放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片废墟中，开始建设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取得显著的成效。这五十八年的岁月，我们二野军大人不仅是见证者，而是亲历其境的建设者。

现在，大家都已是七十岁的年龄段迈入八十岁的高龄段过渡时期，省校史会祝我省校友们在安渡晚年的时候，多多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崇高的精神 无私的奉献

——深切怀念二野军大眷属罗瑛同志

朱朝钰（贵州·铜仁）

“十年磨一剑，《黔讯》度百期”。
期期、页页都渗透着
您的心血和汗水！
从花甲年华到古稀岁月，
无名也无利。
您既非军大校友，
更不是《黔讯》编委。
您是谁，为了谁？

一位四川校友因蒙冤逝去，
其遗嘱请求帮助落实政策。
您主动运用退休前的工作关系，
认真帮助查档案、找资料。
终于使早年冤狱平反昭雪，
党的政策贯彻落实，
类似情况还很有几件。
您既非军大校友，
更不在校史会任职。

您是谁，为了谁？
今年，南京校友随团来黔旅游，
晚间抵筑明晨又将起行，
他们急盼当夜与贵阳校友欢晤，
但已来不及通知校史会其他理事。
关键时刻，
又是您热情帮助，
圆满完成这一特殊接待。
您既非军大校友，
更不是校史会理事。
您是谁，为了谁？

“我是二野军大校友的眷属”！
不为名也不为利，
只为了实现丈夫的理想
和共同的追求。
啊，崇高的精神，无私的奉献！
我们军大人为之振奋、骄傲！
尊敬的罗瑛同志，
我们永远怀念您。

我军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

张廷键（四川·大竹）

在我小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民谚。当我稍懂事后，曾多次问过我的祖父，他也说不清楚，说这是上辈人流传下来的。当时不论是封建社会或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兵都是欺压人民的，当兵的人很多都是反动政府招募来的地痞、流氓、二流子和游民等等。也有贫穷的人被强迫拉去当兵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偷偷地开小差、当逃兵。我这才悟出了一点道理：这些军队是反动派欺压老百姓的工具，所以说：“好男不当兵，当兵无好人”。老一辈人谈到“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真是“谈兵色变”，乱兵过路抢劫、烧杀、奸淫妇女，叫人胆战心惊。“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大批侵华日军占据了我国大批国土，我的家乡——安徽当涂县沦陷了，我们一家人逃难到大山区躲避鬼子兵。我亲眼目睹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兵在我们大片国土上丧心病狂地进行“三光政策”，杀害我们的同胞，奸淫我们的姊妹，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有两个亲人惨遭杀害，我的双目失明的二祖父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1945年，日本侵略者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时，这时我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站起来了，六朝古都南京和全国各地一样，欢天喜地，一片欢腾庆贺胜利，张灯结彩，人人笑逐颜开，相互道喜。可是，刚从前门赶走了日本财狼，却未曾想到国民党政府又从后门放进来披着人皮的美帝虎狼。南京城大街小巷都能随时看到头戴白色钢盔的美国佬，坐在小吉普车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旁若无人，藐视中国人民，不是城南撞到了人，就

是城北压伤了人。出了车祸无人敢管，罪犯扬长而去，国民党政府还在广播电台上大喊大叫，说什么美国是我们的盟国，美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要友好地对待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由政府来解决，市民人等不得闹事等等。但是，出的每件事到底是如何解决的？不得而知，都是无下文不了了之。相反，事故越发不断地发生，愈演愈烈。有一天是学校放晚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班住宿的同学放了学在学校大门前玩耍，突然一辆小吉普车冲上对面金陵女中门前的人行道上，这是正是学校放晚学的时候，学生长龙似的队伍出校门，从车上跳下两个如虎似狼的头戴白色钢盔的美国兵，好像老鹰刁小鸡一样从学生队伍中抓了一个女学生拉上车就逃之夭夭。当时路上行人和女中师生还有我们几个同学跟着一群人在小吉普车后面边追边大声喊“不准抓人，不准抓学生”。这时一群国民党的警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挡住追赶的人群，大喊大叫地说：“他们是我们的盟军，不得无礼，不要影响与盟军的关系，有什么事，政府会出面处理的，你们不要闹事，不要找麻烦”。实际上他们是为虎作伥，好让美国强盗乘机逃跑，眨眼功夫，逃得无影无踪了。这件事到底如何解决的谁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学生是被明故宫飞机场美国兵抓去的，机场里一群恶魔轮奸致死。在学生家长、学校、学生和市民的强烈抗议下，国民党政府怕把事态闹大，才出面与美方交涉，其结果因美方有治外法权的特权，美军人员犯罪中国政府无权治裁，只能送回美国处理。为了平息民愤，抓了两个替死鬼美国兵用飞机送回美国，到底是如何处理的，鬼才知道，这是不了了之。

汪伪的兵、日本鬼子兵、国民党所谓的国军的兵、还有美帝所谓盟军的兵，我都见过，不管中国或外国的，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欺压人民，抢压钱财、奸淫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人间魔鬼，还能是好人吗？因此，我对这些兵是深恶痛绝的恨。

说来也巧，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我在南京金陵中学读初中，1949年南京解放时我又在南京成美中学读高中。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那一天我和几位同班同学一早就来到新街口北面的中山北路挤在欢迎人群中等待观看人民解放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军队？南京未解放时，我听人说过解放军军纪很严，不准打人骂人，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说话态度很和蔼，买卖公平，还不准调戏妇女等等。当时我是不相信世上还有这样好的军队。所以，我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来看看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当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出现在面前时，我看到解放军背的枪是很普通的步枪，穿的也是很一般的黄布军装，很多还是土布的。武器装备也很平常，不像1945年日寇投降时我所看到的国民党进城时的新六军身上背的是全新美式卡宾枪，穿的是黄呢子军装，高统皮靴，还有装甲车，榴弹炮。如果从武器、服装来看两者差距太大，当时我真疑惑不解，解放军就凭这样的装备就把国民党几百万全是新式装备的军队打垮，真叫人不可思议。我正沉思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喊“飞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国民党的飞机已在我们头上盘旋低空扫射了，欢迎的人群顿时就乱了，有的向东跑，有的往西跑，还有的往前面挤，也有向后退，你揪我，我推你，乱成了一团。忽听到有人大吼一声，我还没有听清楚吼什么呢？接着又听到一声巨大的立正的脚步声，这时解放军行进中的队伍停了下来，放下被包整个队伍全部坐在街中心，立刻出现了一条整整齐齐长长的黄色人带，另外有些解放军看来像是军官，跑到乱成一团的人群中有条不紊地做疏导工作，指导大家向街的两边屋檐下躲藏。还有解放军的肩上架起高射机枪向低空扫射的国民党飞机进行射击，有些解放军端起手中的轻机枪也向空中的飞机射击，形成了地对空的激战。国民党飞机见势不妙，怕被击中，恐慌万状地夹着尾巴逃跑了。坐在街中心的解放军有个别的受了伤，背着急救箱的解放军卫生员跑来又跑去忙忙碌碌地为伤员包扎伤口。一切都很有序地进行着，没有一点慌乱的迹象。我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深受感动，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欢迎人群的安全啊！他们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队，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平型关战役中打得小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把国民党反动派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数百万军队打得丢盔卸甲，人仰马翻溃不成军，到处逃串。他们在战争中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人民群众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事事处处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从此，我是彻彻底底地否定了自己过去对兵的错误认识，谁说“好男不当兵”，难道人民解放军的兵不是好男儿吗？他们个个都是最好的好男儿！

1949年5月，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在南京招生，我欣喜若狂，积极与同乡同学相约报名投考，南京《新华日报》在公布录取名单中有李光庭、孙佳壬、张世东、钟林和我等八人。我和张世东等六人被分配在二野军大文艺新闻大队，6月13日报到分在第三中队，我和张世东开始分在第五班，不久又把我俩调到第一分队第三班。我通过一系列政治理论学习后，不仅提高了认识水平，还不断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我这才彻底明白了我过去对“兵”的错误是在没有从阶级观点来认识“兵”的本质问题，旧社会的“兵”都是剥削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她与反动统治阶级（不管它是旧中国的或外国的），用来镇压人民工具的兵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相提并论。有谁见过那朝那代的军队为老百姓救过灾、抢过险、扑灭过森林火灾，疏通过交通要道？只有人民的军队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人民的平安幸福，远离亲人，远离家乡，坚守在零下40℃多度冰天雪地的北国边防线上，或烈日似火，摄氏40多度高温的南疆海岛上，他们不仅承受着奇热奇寒的气候煎熬，生活上也十分艰苦，很多时候吃不上新鲜蔬菜和新鲜食品，他们毫无怨言，以苦为乐，他们这种精神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幕幕灾民们紧紧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含着热泪发至内心感激之情喊着“亲人咯！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啦！”声声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我常常被这动人的镜头，深深激得热泪盈眶，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啊！同时，我又有种自豪感，因为我也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分子，我衷心的祝愿我军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永放光芒。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硝烟未尽，就涌起第一个参军浪潮

——羊城首批学生兵

李宗晖（广州）

编者：承蒙广州李宗晖校友为祝贺《黔讯》出版100期，特寄来他撰写的《黔桂边野战哨一文》。又将他曾写过的《羊城首批学生兵》一文（原载1996年11月15日《羊城晚报》上），《黔讯》许多读者可能未曾拜读过，特此刊出，以飨贵州校友。并向作者致以谢意。

1949年11月8日，《南方日报》一则军大招生的简短消息在广州引起轰动效应：“二野军大四分校招生啦！”“校长是陈赓将军！”“参加解放军去！”投军旋风迅即风靡全城。一时间，中山大学优秀学生来了，广州大学成百人的队伍涌向报名点，华侨大学、国民大学、岭大、省立文理法商学院的大学生源源赶来报名了，广雅、培英等许多年轻中学生成群结队来了，聚在省城众多的知识青年、讲师、医师、工程师、会计师及各种各样专业技术人员，在“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感召下，争先恐后奔向报名。

短短一周，便有3600多名热血青年报了名。随之，远在潮汕、东江、台山、阳江等地学生也闻讯星夜赶来广州报名。港澳同胞、东南亚数以百计爱国学生侨胞，也都三五成群、风尘仆仆返回，坚决要求参军，为解放战争最后尽上一分力。

1949年是我国历史大变革的一年。10月北京城升起五星红旗，但并不意味蒋家王朝彻底毁灭，蒋介石凭借其150万军队和1亿人以上未解放的国土（占全国51%强），妄想以两

广、西南为据点，负隅顽抗，并企望国际风云变幻和美国援助，卷土重来。“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就成为解放战争后期最紧迫任务。

当时我们 200 多万野战军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文化较低。肩负解放西南重任的刘邓第二野战军，为适应战争发展及新区需求，1949 年 5 月在南京建立二野军政大学，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6 月陈赓在江西南昌建立二野军大四分校。刘帅在开学典礼上讲：军大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解放军的缩影。并指示军大党委书记刘华清：“为解放大西南斗争需要”，“要招兵买马，扩大队伍”。陈赓也提出，要多招些文化高的知识青年。广州才刚解放，陈赓就派军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刘增钰入城去见叶剑英，送上陈赓的亲笔信，希望他同意军大在广州多招收些学生青年参加军队。叶帅热情表示赞同，当即答应可在广州招收一千四五百学生，以应解放大西南之需。他还嘱咐刘增钰：你们一定要把我们这批广州学生平平安安带到昆明去，把他们培养成才。

依叶帅和陈赓将军指示，军大 11 月 7 日入城，第二天就在广州张榜招生。没料到，在广州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城市，这么快就形成一股投考军大旋风，报考中出现了许多夫妻双双投军，兄弟一起报名，叔侄姑嫂相约，同学齐心共策的佳话。在投考面试点，处处可听到这样动人的对话：“军大没有高楼校舍，无知名教授，你们为何不读大学，投考这里？”答的十分明确干脆：“我们是来革命的！”“军大远征西南，行军作战艰苦。刘帅在军大讲，革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打仗要死人，你们不怕吗？’回答更是斩钉截铁，铿锵响亮：“革命不怕离家远！怕，我们就不来了！”经过严格筛选，军大四分校在广州录取了 1400 多名学员（海外来的有 100 多）。成为解放后广州人民送出的第一批子弟兵。

军大学生在佛山整训不足月，由于西南战局急剧推进，即于 12 月 22 日提前誓师出征，编入陈赓 4 兵团进军西南战斗序列，番号是“广州部队”，陈赓勉励他们要紧紧“抓住革命的尾巴”，“解放全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了这一千多军大老广兵永萦于怀的铭言和前进动力。他们以满腔革命热情和高昂斗志，走尽了西江水，踏上云贵高原，经三个月行军作战，跨越粤桂黔滇四省，圆满完成进军西南三千里征程，全部获得国家颁发的“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在到达云南昆明后，随斗争形势需要，他们又分别被派赴战斗部队、接管地方政权、参加剿匪、征粮、土改反霸、帮助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改造起义俘虏军官提高部队文化素质，以及创建军事院校等工作。许多人参加抗美援朝，在上甘岭战役中杀敌立功，不少人在解放西南与其后斗争中壮烈捐躯。

47 年过去了，这批军大老广兵已散布全国各地，有的上调军委三总部身负要职，有的成为军师级领导及地方中高级干部，不少成了专家、教授和学者。还有如曾雪麟、冼迪雄这样活跃在体育战线上的知名教练。时过境迁，他们都已是鬓发银霜踏入了花甲古稀之年，但对 47 年前投军献身解放战争事业这段特殊历程却刻骨铭心。不少在海外定居的军大同学，尤其记得并选择这个参军日，从世界各地回广州参加军大战友聚会日。

有记者在军大广州同学参军 47 周年聚会上，访问一位海外同学，问他当时有无后悔舍弃优越生活及事业，在广州参军投军军大？这位同学坦然的说：“我至今仍认为那时选择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如果下世有这样的机会，我相信我同样走上这样参军之途的！”

这就是我们广州羊城老兵的风格

王 司 剿 匪

方仲（贵州·都匀）

1949 年 12 月 16 日，二野军大二团经过五千里行军，到达贵州，部分同志分到原独山

地区（现为黔南自治州）工作。我是分在都匀县公安局，后又派到王司区任公安助理员，区领导配给我四名铁路工人，驻阳和乡，开展工作。

阳和乡鸡场是王司区两个民族乡，古称“内外套”，清末和民国时期，“两套”人民为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曾几次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我们进驻后，积极开展宣传教育，访贫问苦，开展征粮、借粮支援解放军入川作战。在洒洋寨有个外号叫“牛皮筋”的，国民党统治时，他就死赖不纳粮。我在向他征粮时，开始仍是抱着拖和赖的老办法，经过我日夜与他交谈，谈新旧社会对比，谈党的政策，感化了他，最后竟百分之百的交纳了应征之粮。

1950年4月1日，旧保长王苏（系建立的内线）来报，有百余匪徒在我区老寨洗劫群众，还杀猪宰羊。我当即和罗育民政委率区队武装前去剿匪，在与三都县交界的老王山与土匪交上火，土匪退占山头，我们追到山麓，土匪在山上，我们在山下，形势于我不利，这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顷刻之间，大雨滂沱，我们反而人人精神抖擞，与匪激战一小时，土匪被击溃，逃到三都县。次日，我又率四名队员，在追捕逃匪中，捕获匪敌探一名，缴长枪一支。

5月上旬，我率区队六人押着三名匪众，去明英乡哑娘寨召开释放土匪政策群众大会。有一群众向我举报，桃花五寨来了二百多土匪，有企图包围我们之势，我立即与祝新尉班长研究对策，停止召开群众大会，先抢占左边山头，进可攻，退可守。当天土匪未来，我们则趁机将藏在独家村的匪营长杨某捕获，并派三名队员将三名原拟释放的匪众走捷径解送回区，李区长知情后，率区队主力在当夜十二时与我们汇合后，转去四保，于次日拂晓，在桃花五寨河边，遭遇土匪，激战了半小时，匪溃逃到马寨去了。

在王司区最大的一次剿匪是发生在1950年8月1日。土匪“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东南绥靖区黔南游击司令部”第一纵队司令江志华率三个师，两千余匪众围攻我区政府，时达三天四夜。我区全部武装力量，仅五十余人、枪，敌我力量是四十比一，加之电话线被土匪切断，与外界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在危急关头，前边提到的“两套”民族乡的民兵联防队在乡长蒙光辉的率领下，前来支援，并独挡一面要隘，还及时通知三都县驻军，及时赶来一个加强班。在这场剿匪战中，二野军大的方仲、李昌仁和五分校的周达云、上官志、吕志成等校友和其他同志一样，坚守阵地，表现英勇。我两次几乎中弹，一次是在8月2日战斗最激烈时，我与连指导员、警卫员查岗时，警卫员常协玉同志在我背后，不幸中弹牺牲。坚持了四天三夜的防御战，主力部队赶到，一举击溃土匪，捣毁了匪指挥部，俘虏了匪连长以下四十余人，四天战斗共击毙匪营长王登义以下三十余人。

1950年，土匪叛乱之初，凡当上土匪营团长的，在当地都是称霸一方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或潜伏下来的敌特之类的人物，如罗家寨的罗时荣，曾任国民党都匀县的区长。四保的王维璜开始是匪支队长，不久还“荣升”为匪师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抢光王司区库存二十万斤粮食。我作为公安助理员，侦察敌情，逮捕暗藏匪特等这些任务都落在我的肩上。如当年4月，决定逮捕匪团长罗时荣，行动前不能暴露目标，我们摸黑绕道四十余里（走直径只需八里）到罗家寨罗匪门口时，已是凌晨五时，我们冲进去，罗时荣还在床上做着美梦，被我们活捉。又如土匪营长王国品刚到家，我们的内线就来报告，我首先翻窗入室，祝班长跟着进来，在床底下活捉了王国品。我们前后共捕获了伪乡长、匪营长杨宗昌，两个匪司令江志华、韦德明，丹寨县的匪营长等，极大的震慑了区内的反动分子，消除了一些隐患，有利于各项任务的开展，为征、借粮食支援前线提供了保证。

自1950年10月都匀军分区实施了铁壁合围，各大小股匪先后被歼，随之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清匪、镇反，形势极大的好转。

随后，我亦调回都匀县公安局任予审科长兼县法院审判长。光阴荏苒，岁月风驰，五十多年一瞬而过“江山长润秀，我鬓已飞霜”，而今斑白离休，研习诗词，安度晚年。

战斗在匪患重灾区里

建国初期云南寻甸二区军民联手剿匪反霸建政纪实

梁超（安徽·宿州）

1950年9月中旬，云南曲靖地委工作队整训总结后，我调往寻甸县工作，寻甸县是曲靖全区最早在征粮期间出现土匪暴乱的。1950年4月24日土匪暴乱，南下干部李如椿同志被匪徒俘去，绑在树上严刑拷打，准备处死，后因援军及时赶到，匪徒仓皇逃跑而获救。

我到寻甸的第二天，分配在第二区（麦厂区）任民政助理员。二区是寻甸县的大门，昆甯铁路横贯其间，上官乡，易隆乡的两个火车站（上官庄站和易隆站）附近情况非常复杂，潜藏着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旧军官，土匪特务等，他们以搞木柴联营，装卸工，小商、小贩为掩护，勾结当地地痞流氓，地主恶霸欺压群众，盘剥劳动人民，横行霸道，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就是这些潜藏的敌人，趁人民政权初建之机，为非作歹，造谣惑众，暗中勾结起来企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在我调来之前的1950年8月份，猖狂的匪徒，竟然扒断铁路，抢劫火车上的财物，这次突发事件震动全省，省委及军区领导迅速作出决定：从昆明警备部队中抽调战斗力最强的洛阳英雄连前去清剿，集中优势兵力痛击土匪王树生部。王匪原为云南赵义部队的一个排长，趁整编调防途中，率全排武装叛变。据知情人言，抢火车的地点就在我辖区内上官庄车站和易隆车站之间的张普屯地方，土匪头子宋开科就住在车站附近大凹村，他原是河南惯匪，后进国民党军队，流窜云南，是典型的兵痞土匪，为害一方。叛匪王树生抢劫火车上的财物能够得逞，主要就是通过宋匪勾结潜藏在铁路部门的板道工，先扒断铁路、火车被迫停在山凹处，两边山头上架起机枪，乘客被赶下火车搜去财物，匪徒们十分猖狂。昆明警备部队火速赶到，迎头痛击，众匪徒慌忙逃跑，有的就潜藏在附近的地主、恶霸、土匪家中。为了跟踪追击，发动群众分化瓦解，彻底清剿，力争在三个月内剿灭这一帮土匪。

为此，地区政府召开了有昆明剿匪部队首长参加的寻甸，嵩明，马龙三县领导出席的会议，决定成立清剿联防指挥部，警备部队配合地方干部组成武工队，结合减租退押，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匪情。匪首宋开科，王树生等先后落入法网。在宋开科、王树生等匪徒为害的地方，及时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处决了一批十恶不赦的匪首，群众拍手称快，表示一定要配合解放军和政府清除匪患。群众起来了，一些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混进革命基层政权的旧军官等，得到及时镇压和清洗。如我区塘子乡乡长马某，原为国民党保安团连长，解放后回乡摇身一变成为塘子乡乡长，他勾结邻县嵩明匪首王茂林（王为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在区政府干部到塘子村时，他就通风报信，是个明目张胆的反革命份子。其父马成龙是地方恶霸，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周围群众赌咒发誓就说：“我要是怎么样，就叫我赶塘子街撞着马成龙”。由此可见其罪恶之大。武工队进村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在掌握确凿材料后，为了解除群众顾虑，首先逮捕了马成龙父子，并及时召开公审大会予以处决，群众十分高兴，拍手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大军好！”

为了深挖潜藏的敌人，我们在机关内部开展了以反地富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我们这个区共有干部17人，区委书记和区长等8人是我地下党同志，军大校友2人，有一个武装班10多人，班长是个保安团兵痞。在这样一个匪患严重的区里，敌我竞争相当复杂。在区整风学习会上，我们与警备部队留区上的负责同志深挖区政府内潜藏的敌人，挖出一个暗藏的坐地匪徒内奸。

经过深入发动群众揭批查，一批混进人民政权的暗藏敌人，有的被清洗出革命队伍，有的逮捕法办，初步纯洁了革命队伍。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采取军事围剿和政治分化瓦解，发动群众的方针，1951年全区匪患基本清除，顺利地转入减租退押，为下一步土地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接着，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作了调整，我任副区长，代理区长职务。

黔 桂 边 野 战 哨

李宗晖（广州）

这里记忆的是进军西南中刚踏上贵州境内兴义的一段惊险经历。

二野军大四分校作为四兵团战斗序列，紧随陈赓将军从广州出发，溯西江而上，跨越十万大山，横穿广西全境，于桂西北进入贵州转云南。

部队过田东百色之后，征程更艰难险恶。我们跨上云贵高原阶梯，几十里人烟少见。每天行军由八九十里到110里，而且都是一层层翻越抬头望不见顶的崇山峻岭。国民党残匪不时骚扰袭击，军大同志已失踪牺牲不少人了，病号车遭伏击牺牲十几人的惨剧更是个响亮警钟。我们已深深体验到革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真实味道。

我是在南宁时第一批入了青年团，因此，要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行军中不是打前站就是作民运纪律检查，或充当“收容队”。到了桂黔边境，残匪猖獗，大家提高了警惕，掉队的人少了，我也较多时间跟大部队行动。

1950年春节刚过，才入贵州境内不久，一天到宿营地后，我已累得要死，正躺在草铺上休息，曹文彬队长和赵遵贤副指导员把我叫去，一开口就说：“小李子，给你一个任务，明天当护卫哨，护送队部马匹”。并郑重交代：“马驮着机要文件和全队资财菜金，一定要保证安全！”我心想，就跟跟骡马走走嘛，又有何难？“湿湿碎”（粤语：小意思）罗！即随口答应：“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甩着一只断臂的赵指导员看我那副漫不经心样子，瞪着两只小眼严肃说：“别大意，小鬼，这里是兴义，是国民党头目何应钦的贵州老家，土匪嚣张，遇到情况，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机要文件和财物，”我才心里多加了一根弦。

第二天一早，我和胖墩墩的北方战士小刘胡乱吞了几口饭，就赶在大队伍开拔前走了，希望能早点儿赶到宿营地。开始倒也顺利，骡马四腿交错地向前走，我也悠悠哉哉地背着已打补钉的老七九步枪跟在马后面，吸着带点露水的高原清新空气，倒也自在开怀，慢慢一队队人马来了，我觉得我这武装护卫哨也挺神气的，得意的同熟人打招呼，很有自豪感，哪知，厄运来临了，还没走一半路，原先乖乖精干的小骡马突然耍开了脾性，也不知是它疲劳过度，还是我们服侍不周，或者是突来什么伤风鬼打的，竟然不听使唤，走走停停，有时干脆就立定不走了，让我一时不知怎样是好，忙叫小刘想办法。而这时我才知道，小刘也不是正宗小马倌，他原是个当采买的事务员上士，只因昨天饲养员病了，临时抓着来顶替赶马的。这一下我更急了，两人使尽浑身解数，又打又拉，又哄又吓；一会儿灌水，一下子又喂食，拍屁股，却老讨不到它的欢心顺气，总是走几步又赌赌气，磨到快黄昏了，离宿营地还有好几十里，而这时大队伍一队队走过去了，后面的炊事班收容人员也过去了，而我们却还磨磨蹭蹭，推拖慢挪哩，想到这兴义何应钦老巢和前几天病号车的遇袭，委实也有点不知所措。正发愁中，走在大队最后的李长春副政委来了，这位浑身工农干部作风，深受学子敬仰的大队首长，一见就十分关切的询问情况，叫我们不要急，他查看一下马的情况，似亦无大病痛，他交待小刘不能靠打，要摸摸马的脾性需求，捉摸些可行办法。他也特地告诉我们，这一带是复杂些，要加意警惕，但也不要慌张，敌残匪也摸不清我们，而且更怕我们解放大军。况且我们军大后面还有炮15团。如发现周边有情况，要沉着冷静不要打草惊蛇，想办法保护好公家财财物，相信你们会很好完成任务。晚了我们也会安排人来接你们，他亲切教导后就带着警卫员匆匆去赶前面队伍了。经李政委这一指点，我心里踏实清醒多了。我们按他所指办法，摸顺骡子脾气，拉拉扯扯，较顺当的上路；另方面

也作了可能紧急应变安排。我告诉小刘：“你赶住骡马在前走，我稍拉点距离跟后面，我们都注意观察周围动静，万一遇有袭击变故，我开枪示警对付，并拖住敌人，掩护你跑脱。你急速背上马背上文件财物，夺路远走或隐蔽起来，等待部队救援”。这时，我已将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好像更成熟笃定了，自己似乎也更高大、无所畏惧。四周一片静寂，大路上没有别人，我斜挂着枪从容自信的在骡马后面走着，绕过一个个山弯道，也许是大军的声威已让败军吓破了胆，或则残匪也摸不清我们底细，怕占不了什么便宜，没敢妄动。天越来越黑，我们离宿营地也已不远，大队依据李副政委指示，又派警卫班跑好几里路来接我们。到晚9点钟，我们终于又一次闯过警险难关，到达了宿营地，安全完好地完成护卫野战哨任务。

当晚还有个野哨小插曲，夜三点，我正值前山岗哨，全神贯注盯紧西北角的灯光，几里外村寨有数百残匪，这时背后山坡铁沙沙沙作响，我思忖，敌人会不会来摸哨袭击，下意识悄悄拉开步枪保险栓，忽的一庞然大物，已从侧后飞扑而下，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还以为是个老虎，伸入扳机之手，差点儿把枪扣响。原来是只野黔驴作祟，我幸好未冒失的把队伍惊动。交班时，我嘱咐传下去，天亮来抓野驴！可惜黔驴已滚落到山凹不知去向了。在贵州安龙县，我们军大还帮当地驻军戒严并搜查抓获残匪许多的潜藏武器弹药和漏网匪徒。可见当时贵州土匪为患相当严重，是很不平静的。半世纪前云贵高原，诸多战火经历记忆，令我至今深刻难忘！

以敌制敌 巧脱险境

张才显（重庆）

（原文载重庆市沙坪坝区校史会《军大情深》）

1950年初，我和20多位校友分配到川南行政公署粮食局工作。粮食，在新解放区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关系到新生政权的巩固、人心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要保证城市粮食供给，保障军需、民食。因此，当时党、政、军各级领导都把解决粮食问题当作头等大事的政治任务进行部署。

我们分到川南粮食局后，组织上安排我和许贯文校友到泸州专区协助调粮。我俩先到泸州专署财粮科报到，冯科长接待了我们，叫我俩到古宋县去帮助调集粮食。次日我俩赶赴古宋，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固定班车，我们搭上一辆顺路军车，把我们带到了纳溪。从纳溪步行到江口镇时，天已经黑了，但江门离古宋还有40多里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决定在江门住宿一夜再走。

这是1950年2月的一个夜晚，我和许贯文住进一家小旅店，楼下是茶馆，楼上是客房。刚住下来，一位中年女店员悄悄地对我们讲：“解放军同志，你们今天晚上要当心哟！听说离这里40多里叙永那边，有一帮土匪可能要到这边骚扰。”因为我们刚从军大毕业，穿的还是黄军服，所以老乡叫我们“解放军同志”；同时，为了安全自卫，每人还佩带了一支手枪。听到女店员讲的这个情况后，我和许贯文商议，如果走吧，天已黑了，不是个办法，如果到老乡家去住吧，也不一定保险。最后我俩决定去找乡公所。当时乡公所还是旧人员在维持。我们就问这位女店员：乡公所的乡长姓什么，这个人怎么样？她说：“这个乡长姓王，是个舵把子（地头蛇）”。

我们当即前往乡公所，很快就找到了这位乡长，我们把他请到小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开门见山对他说：“听说离这不远有一股土匪在骚扰，今晚会不会来这里，我们也不知道”。接着我们又说：“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在这里，我们的安全就拜托你了，还要请你留在这里，死活就在一起吧！”这位乡长说：“我怎么出去打招呼呢？”我们说：“你下面还有人嘛，可

以叫下面的人去办呀！”后来他把文书喊来，交待说：“这两位解放军同志今晚住这里，要负责他们的安全。”就这样，这个晚上没出任何事。次日天刚亮，我们要离开了江门，赶往古宋。在土匪全部肃清之后，才知道这位“乡长”是土匪供给部长，后来被镇压了。

我讲述这个小故事，不由地缅怀起在征粮剿匪的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生命的一千多位军大校友。他们面对土匪施加的酷刑，横眉冷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声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她）们的壮举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被人们广为传颂。英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共和国今天的辉煌、强大和威武，换来了人民今天的幸福美满生活。英烈们的鲜血不会白流，他（她）将永远激励后人为建设现代化祖国奋进。他（她）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英烈们如果有知，也会为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而含笑九泉。

在战火硝烟中度过青年年华

李中维（四川校友、现定居贵阳）

我是四川安岳县人，今年七十七岁。1949年我由学生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毕业。在战火硝烟中度过的青春年华，可说是历尽千难万险。为人民翻身解放呕心沥血。至今转眼已是五十多个年头了。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思当年，我们为建立、健全县、区、乡革命政权，日夜辛劳，废寝忘食，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白天黑夜上山下乡，一天步行几十里，上百里，晚上还要继续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寒天暑热，饥肠辘辘，睡岩穴坐屋檐通宵达旦，经常是汗水和雨水，衣裤湿透。征粮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段时间，我们在同隐蔽的敌人作斗争的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那时我们舍生忘死地完成党的事业，毫无怨言，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我两次幸存没有牺牲，真是我的幸运。今天不管我的日子过得如何艰辛，我都感动舒心而愉快，因为我们是二野军政大学的学子，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学生。军大毕业时，我们向党向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宣过誓，写过保证书，“要为人民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不惜流血牺牲”。我们确有许多同志和战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而牺牲。如：周进烈士，战斗中他小腿被打断、同志们撤退时，他还在继续战斗。因他身穿军装，而当时的土匪最怕，也最恨解放军。所以匪徒们攻上去后，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还生怕他未死，又把他的头按在水田里淹，残忍至极，牺牲时才十七岁。

1950年我在匪情通报中，记录下这一段，“四十六师，师直机关组建了一支剿匪小分队，由郝虎田同志任队长，途中遭到匪首高竹梅、舒志斌带领300多匪徒，在川桐乡偷袭剿匪小分队。在战斗中，军大学员陆琳华同志身负重伤，土匪追上逼他投降。陆琳华同志坚强不屈，大骂土匪。凶残的匪徒割去陆琳华同志的舌头，挖掉他的双眼，砍断他的双手和双脚。人民的英雄儿女陆琳华同志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二岁。在贵州兴仁国民党起义部队，我军派去五位同志（军大学员）去任联络员，后这支起义部队叛变，五位同志被惨杀。至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在贵州许多二野军大同学牺牲最英勇、最惨烈，如郭继盛同志被活埋，荣先治同志被砍杀。”

1950年3月3日，四川合江匪首韦映辉、张伯林围攻福宝区公所，其中有二野军大和西南服务团的，共约三十人。撤离时直奔修竹乡，因天黑下雨，汤超和陆季平同志散落在后面，被十多名土匪包围。汤超以仅有十多发子弹进行顽强的抵抗，后因左臂受伤，和陆季平同志一起被俘。在严刑拷打审问中，汤超同志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太义凛然，表现出军大学子的铮铮铁骨和对党对祖国的耿耿丹心。三月二十日下午，被匪首刘相莹枪

杀于虎头乡红花村山顶上，身砍三刀，暴尸荒野。1951年4月，在剿灭邓大宗惯匪时，“血染佛尔岩”我是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右膝断了，挣扎不动，土匪正上前补火，幸被战友陆云、欧旭东同志一齐冲上前，用冲锋枪横扫，匪徒带伤逃路。我在敌人枪口下抢回了一条生命。可惜陈凯、王文华两位才华出众的同志牺牲了。陈凯，脑袋被打开花、脑水四溢。王文华肚子被打破，肠子落出来，染红了一片草地。惨烈之状令人心寒。在祭奠他俩的亡灵时，同志们欲哭无泪，默默无声沉痛哀悼!!!

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来临之际，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建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富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全国人民正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全国建设小康社会而阔步前进。

亲爱的革命烈士们，你们安息吧，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

怀念九班的战友

赵文（成都）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解放了，中原军政大学开赴南京，改名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开始筹备招生，我经友人（地下党员）介绍，在未公告招生前就到军大报名。由于我的一段特殊经历，即被领导留在校部，协助招生工作。一个月之后，报考军大的学员已报到入学学习。我向领导提出下队学习，得到批准，到三总队十二大队一中队报到。队长李万和同志，指导员刘玉书同志（之后不久，调走、调来熊维臣同志任指导员）。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并说叫我到九班当班长，介绍说，现九班班长张虹（江苏人）和副班长杨明镐（湖北人）两人不团结。班上分为两派，是中队问题较多的班。希望我去后能改变后进班的局面。到九班后，我把在校部工作一个多月向老同志学来的一点经验，运用到班上。比如多个别谈话，交流思想，强调团结，开好民主生活会，诚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严格要求自己，学习上、训练上、生活上处处模范带头等等。九班面貌很快改观，多次受到中队的表扬，也受到下中队蹲点的十二大队政委郭毓芬同志的关心和表扬。郭政委是老红军，校党委委员，威信很高。

1949年6月16日，敬爱的刘伯承校长来校作报告。他首先以自信的热情欢迎同学们到军大学习。勉励大家学习革命理论，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军大精神。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讲到当前的革命形势。接着他说：“什么是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问大家怕不怕？并说：“革命是自愿的，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再来还欢迎！”当时刘伯承校长已年近60岁，站着讲了近四个小时。他的讲话既严肃，又亲切，正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听报告后，有减员现象。不少的班有学员不辞而别，开小差了。有的中队接连走了九个。在分班讨论刘校长的报告时，我说：“刘校长在报告中肯定了宁、沪、杭等地的青年具有革命性的，多数参加过游行示威各种斗争。我们参加军大是自愿报考来的。要光明正大，决不能当逃兵，有啥思想包袱，应该丢掉”。会上大家热烈发言，赞同我的意见。会后有两个学员个别向我说了他们的家庭具体困难。我及时向中队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上答应研究解决，我们九班思想稳定，团结一致，在学习和军训各方面都一致领先。

1949年9月校党委决定，在全校开展学习竞赛、评模运动。通过学习、评比，全校共评出2360名学习模范、工作模范（分为一、二、三等）；11个模范中队；101个模范班。我们九班通过中队、大队评比，总队批准报校部，光荣地成为模范班。我个人也被评为一

等学习模范。

贺模大会后不久，张际春副政委来校作了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全校重新作了调整组合，以总队为建制，抽调干部、学员组成一、二、三、四团，作为第一梯队，随野战部队先进军西南。去接管云、贵、川、康四省。抽调部份学员去二野军医大学（现在的三军医大），电讯支队，特科支队，教干大队，后勤大队等继续专业学习。提前分配少部份学员到校部、总队、大队工作，充实干部力量。我们班共有十二人，张虹、吴肖林、彭达诚等四人编入三团，随野战部队先进军西南。副班长杨明镐率何茂泉、李公燮、陆文琦去军医大学报到继续学习。方健康同志调后勤大队继续学习，张会魁等二同志因家庭特殊情况，由组织安排转到南京地方工作。我调到十三大队政治处宣教股任宣教干事，开始了新的工作。

13大队随校部进军大西南后，校部驻重庆歌乐山林园，13大队驻山洞。二野军大于1950年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政大学。13大队奉命成立俄文训练团，培养俄语翻译人才。我在俄文团政治处任技术书记。我曾两次去覃家岗二野军医大学（后改为七医大，现改为三医大）驻地看望杨明镐等四同志。后来他们毕业分配时，只有何茂泉一人留校工作。不知杨明镐、李公燮、陆文琦同志分到何地工作，从此失去联系。方健康同志进军西藏，后转业地方工作，在冶金部门离休。彭达诚同志到四川后调到省档案局工作，一直到离休，在档案工作上颇有建树。何茂泉同志在极左的年代，曾受到不公正待遇，落实政策后，在重庆离休。张虹、吴肖林同志到达川南宜宾后，参加剿匪建政工作，扎根宜宾，直到离休。我和他们时有来往。光阴荏苒，岁月如流，转瞬间58年过去了。值此庆祝建军80周年，军大建校60周年之际（从豫陕鄂军大算起），我十分怀念九班的老战友们。杨明镐、李公燮等6位战友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的人生里程碑

——回忆二野军大的学习和生活

（原文载重庆市沙坪坝区校史会《军大情深》）

张鹤龄（合令）（重庆）

（一）参加革命去

一列开往南京的火车从苏州站徐徐启动，蒸汽机发生的喷汽声，铁轮和钢轨的撞击声，节奏随车速加快。我和三位高中同学此时心情非常激动：考二野军政大学去！参加革命去！

这是1949年6月13日，我满十九周岁才5天，我的家乡江苏省吴县解放还不满两个月。当时我在苏州城内私立有原中学读高中二年级下期，学校里已有几位同学投笔从戎，穿上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仰慕极了！

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1944年下半年和1945年上半年我在吴县黄埭镇私立启新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老师中有地下党员，常给学生讲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故事，特别是讲到小八路，放牛放羊等儿童抗日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还讲解放区人人有书读、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情景，我非常憧憬。1947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衰败到经济困窘，不让我升高中了，我看到国民党政府过去消极抗战，害得我们当了八年亡国奴，吃尽苦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劫（接）收大员”满天飞，出来摘胜利果实，又挑起内战，从家联想到国，联想到自己，深感我的出路就是跟共产党闹革命。曾和同乡好友朱介生一起离家出走，打算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因我们两人都只十七岁，从未出过远门，想得很简单，到了镇江，遇到国民党封锁长江，我们又不知道新四军在苏北哪里，身上带的路费又少，在旅馆住了一宵，朱介生动摇了，我只好跟着返回老家。这样一来，